

# 在視閾融合中闡釋

熊月之

歷史研究中，人物研究較之事件研究、器物研究更具有時代性、對話性與闡釋性。人物研究中，那些站在時代前列、涉及事件眾多、影響廣泛、兼具行動家與思想家身份的巨人的研究，較之那些跟隨潮流、活動較為單一、不具有思想家身份的普通或專門人物的研究，更具時代性、對話性與闡釋性。孫中山是近代中國為數極少的站在時代前列、涉及眾多事件、有系統思想著作、影響廣泛、兼具行動家與思想家身份的巨人，對於他的研究，遠較其他同時代人更具時代性、對話性與闡釋性。

所謂歷史研究，包括人物研究，儘管表象色彩斑斕，內容千門萬類，但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從研究主體與研究對象的關係而言，無非兩端：一是求真，追尋已經逝去的不可複製的真實，諸如事件發生的時間、地點、過程，人物的生卒年代、生存環境、社會關係等；二是索義，探索那些歷史真實的意義。兩者關係密不可分，求真的終極目的仍是索義，索義的前提與基礎亦離不開求真。歷史作為過去的存在，已經逝去，不能重演；反映歷史真實的資料，無論怎麼豐富，總是小於歷史真相。因此，從求真角度看，歷史資料的蒐集與考證，是永無止境的。就此而言，孫中山研究儘管已經取得了相當輝煌的成就，出於不同學者、不同部門、不同形式的孫中山選集、全集的編撰，內容翔實的《孫中山年譜長編》的問世，不同主題的關於孫中山研究的專著出版，蒐羅極豐、圖文並茂的孫中山圖冊的出版，特別是與孫中山往來函電的蒐集、整理與出版，都為復原真實的孫中山提供了重要的支撐。但是，縱觀孫中山一生的足跡，特別是他一些重要活動的關節點，對其重要活動的影響因素，都還有一定的資料發掘空間。

比如，從 1912 年到 1925 年的十四年間，除了出任臨時大總統、流亡日本、到廣州組織軍政府、出任非常大總統等不長時間外，孫中山有大約九年時間是在上海度過的。他在上海居住期間，並不是國家領導人與政府要員，那麼，他的安全是如何得到保障的？他不止一次地說，他在上海的家門口有巡捕站崗，安全有保障：“譬如我的門口，現在有兩個持槍的巡捕來保護我家。上海凡是有錢的人，或者是在各省做過了大官的，都用有巡捕守門。”<sup>①</sup>那麼，上海租界在這方面的制度到底是如何設計的，孫中山如何通過這一制度來確保安全？這方面還缺少深入過細的研究。

又如，1918 年，孫中山在廣州任護法軍政府大元帥時，因被桂、滇軍閥架空，遂辭職轉赴日本尋求救援。正在困難之際，為料理父親喪事一直留在上海的宋慶齡給遠在日本的孫中山發出電報，說“已與法國領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sup>②</sup>這意思是上海法租界可以保障孫中山的安全。那麼，宋慶齡所說“已與法國領事交涉好”的實情究竟是什麼？是誰去交涉的、怎麼交涉的、各項條件是什麼？此中細節一直不很清楚。

這兩個問題都與法租界的制度及其運作有關。法租界是專管租界，法國領事權力很大，不同於公共租界的商人自治。對於這兩個問題，曾任法租界巡捕房翻譯、督察長的薛耕莘可能有所知

曉。筆者曾經採訪過他，他說他在監牢裡曾寫過詳細的資料。這些資料將來公開以後，對於破解這些歷史之謎，或許有助。

再如，與宋耀如的交誼，是孫中山社會活動的重要方面，對孫中山影響至大，但是，孫、宋交誼的一些關鍵細節仍不清楚。以他們最初交往的時間而言，在已經出版的著述中，就有三種不同說法，即 1894 年、1892 年與 1886 年以前。一般論著採用的是馮自由所著《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的說法，稱孫中山是 1894 年在上海訪問王韜、鄭觀應時，得以結識宋耀如。孫中山在 1912 年致友人信中，稱自己結識宋耀如是在“二十年前”，即 1892 年。函稱：“宋君嘉樹者，二十年前曾與陸烈士皓東及弟初談革命者，二十年來始終不變，然不求知於世，而上海之革命得如此好結果，此公不無力。然彼從事於教會及實業，而隱則傳革命之道，是亦世之隱君子也。弟今解職來上海，得再見故人，不禁感慨當年與陸皓東三人屢作終夕談之事。今宋君堅留弟住其家以話舊，亦得以追思陸皓東之事也。”<sup>③</sup>這是 1892 年之說的來歷。宋慶齡晚年所寫《我家和孫中山先生的關係》一文，述及孫、宋最早接觸的歷史，稱他們相識地點是在美國，時間是宋耀如 1886 年回國以前。文稱：“孫中山先生在美國時常向中國學生演講宣傳中國革命和改革的必要。我父親那時見到了孫中山先生，他們成了好朋友並一起旅行。……父親後來還在經濟上幫助過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sup>④</sup>這是 1886 年以前之說的來歷。三說孰是？有待更加有說服力的資料問世。有一條可供追尋的線索，即步惠廉。步惠廉（William Blount Burke），美國人，1864 年出生於佐治亞州，1887 年受差會派遣來中國，曾任慕爾堂牧師、監理會上海教區長，長期在上海地區傳教。他與宋耀如為在美國讀書時的同屆校友，來上海後與宋家過從甚密，曾幫助宋霽齡去美國留學，也與中國許多政要（如鈕永建）有密切關係。他留有系統的日記，其子據這些日記所寫的《我的父親在中國》（*My Father in China*）中，就有很多涉及宋家的資料。步惠廉很可能還會存留其他資料，如深入發掘，或許能有新得，亦未可知。

至於闡釋孫中山實踐與思想的意義，空間更大。眾所周知，任何對於歷史偉人的研究，都不是純粹的發思古之幽情，其研究對象是過去，但立足點是現在，而面向的是未來。誠如李大釗所說：“歷史不是只記過去事實的紀錄，亦不是只記過去的政治事實的紀錄。歷史是互過去、現在、未來的整個的全人類生活。”<sup>⑤</sup>對於孫中山實踐意義的解讀，對於孫中山各種思想的闡釋，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離不開研究對象即孫中山實踐與思想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帶有研究主體所處時代、環境與個人的特點，還會印有研究主體自身的情感、偏好，實質上都是研究主體與孫中山實踐與思想的對話，都是一種古今、主客視閥的融合。在這個意義上，不存在作為脫離研究主體視閥的、純粹客觀對象的孫中山思想闡釋，有一千個研究者，就會有一千個孫中山形象。作為求真對象的孫中山，資料或可窮盡；作為索義對象的孫中山，闡釋永無止境。以筆者近些年所費精力較多的上海城市史而言，我每隔幾年重讀一遍孫中山文集，都會有新的心得與體會，都會對孫中山的思想產生新的看法，腦海中的孫中山形象都會有所變化。

比如，二十幾年前，我讀孫中山史料，研究孫中山與上海城市的關係，關心的是孫中山在晚清來過上海多少次，見過什麼人，做過什麼事，民國時期在上海住過什麼地方，對上海城市印象如何，等等。十幾年前，我讀孫中山史料，關注的是孫中山對於東方大港的設計，是孫中山對於市政建設的理念。最近幾年，重讀孫中山，便發現孫中山的全球視野相當突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態度相當大氣、開明、睿智，在文化自為方面的努力相當自覺。回想起來，這些差異，其實都與不同時期我們國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階段、重點任務、社會關注的重要話題有關，在一定

程度上都是將社會關注的現實問題，投射到孫中山的實踐與思想方面。研究主體的興趣在轉移，孫中山實踐與思想中那些與此相關、相近、相通的資料，就會適時地閃光，吸引研究主體的關注。

孫中山思想具有同時代人少有的豐富性、深邃性與超前性，對於孫中山思想的闡釋，便有較同時代其他人物更大的選擇空間與發揮餘地。我最近仔細研讀孫中山關於上海租界的論述，特別是關於租界是次殖民地的論斷，便很受啟發，覺得這對於解釋上海租界的特殊性，很有價值。

在各種不同的場合，孫中山發表過不少對於上海租界的看法。他曾經說過，上海租界市政管理很好，是一個地方自治的模範：

上海的這一部分地方，是外國的租界，但實在是一個自治的模範。因為上海的租界，不是中國政府管的，也不是外國那一個政府管的。管理租界的究竟是什麼人呢？都是各國的商家。各國的商家，離開他們的本國，來上海做買賣。來的多了，他們自己就組織出自治的團體，來管理自己的事業。所以說他是一個自治的模範。……上海租界這個地方，雖不能和文明國的自治一樣比，但他也可以算個自治標本。<sup>⑥</sup>

1916年，他在寧波演說時，一再以上海租界的市政建設為例，要寧波人向上海看齊，振興實業，整頓市政。他說：“凡市政之最要者，鐵路之改良，街衢之清潔是也。試遊上海之公共租界，其道路之寬廣為何如，其街衢之清潔為何如，寧波何嘗不可仿此而行？”他希望寧波能建設成中國第二個上海，成為中國人自己管理的模範的上海。<sup>⑦</sup>

但是，孫中山作為偉大的政治家，他對於租界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的這一本質，看得很清楚，也絕不含糊。他在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就表示將來一定要將租界收回。以後，他多次重申這一意見。他將上海與香港進行對比，說香港是殖民地，上海是次殖民地。他認為，次殖民地不見得比殖民地好，在香港立法局，有幾個中國人，他們有很大的發言權，還可以議訂法律來管理香港。上海則不然：

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在租界之內，大多數做生意的是中國人，納稅的是中國人，勞動的也是中國人，試問中國有沒有人在上海工部局裡頭能夠有大發言權呢？中國人能不能夠在上海工部局裡頭議訂法律來管理上海呢？我們在上海是主人，他們由外國來的都是客人，他們居然反客為主，在中國的領土之中組織一個政府來加乎我們之上，我們人民不敢過問，政府不能管理。用香港和上海比較，究竟是在香港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呀，還是在上海的中國人所享的主權高呢？不但是上海是如此，凡是外國人在中國所到的地方，他們便無法無天，為所欲為。所以中國現在不只是全殖民地，比全殖民地的地位還要低一級。我就這個情形，創立一種新名詞，叫中國是“次殖民地”。<sup>⑧</sup>

將租界稱為“次殖民地”，稱次殖民地較全殖民地地位還要低一等，這是孫中山的發明，遠不同於我們習知的“半殖民地”內涵。

作為一個強烈的愛國主義者，孫中山對於華人在上海租界所受的歧視，極為憤慨。他特別提到了外灘公園和其他公共場所對華人的歧視：

好比香港的公園，無論什麼中國人都可以進內面休息。上海的黃浦灘和北四川路那兩個公園，我們中國人至今都是不能進去。從前在那些公園的門口，並掛一塊牌說：“狗同中國人不許入”。現在雖然是取消了那塊牌，還沒有取消那個禁例。在香港之內，無論是什麼地方，中國人都可以進去；在上海便有許多地方，中國人不能去。好象在上海的英國會館，中國人便不許進去，就是有英國的朋友住在內面，中國人只要進去看看朋友，

都是不能破例；至如在香港的英國會館，中國人還可以進去看朋友，還可以進去吃飯。<sup>①</sup>

一次，孫中山回上海，上海西文《字林西報》發表文章，主張拒絕他進入租界。孫中山很是憤怒，發表談話說：

上海為中國領土，吾人為主人，彼等不過為吾人之賓客，賓客對於主人，固無拒絕主人入內之權利。如租界當局果阻余入租界，則吾人對此不能不有出以斷然手段之覺悟。現時中國已達撤廢一切外國租界之時期，吾人為貫徹此目的，不惜為最大之努力。中國國民已不能再坐視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內肆其跳梁跋扈也。<sup>②</sup>

在孫中山的對外主張中，收回租界、收回海關、取消治外法權是三大中心議題，是他反復強調的。

孫中山不愧為目光如炬的偉大先行者。作為政治家，他對主權問題，毫不含糊，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主權的侵奪，堅決主張收回租界。作為思想家，他在香港、上海兩個城市都生活過，敏銳地發現兩地人民在政治權利方面的差異，提出了“次殖民地”的獨特論斷。作為具有世界眼光的改革家，他又細心地看到上海租界在市政建設方面所取得的非凡成就，看到了地方自治的獨特價值。孫中山這種從不同角度、不同側面對於租界的分析，為我們分析租界的性質、影響，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總之，無論是史料發掘方面，還是意義闡釋方面，孫中山研究都還大有可為，後者的天地更為廣闊。

---

①⑧⑨⑩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孫中山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34、386、387、319頁。

②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四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484～485頁。

③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342、351頁。

④宋慶齡：《我家和孫中山先生的關係》，北京：《黨

的文獻》，1994年第5期。

⑤中國李大釗研究會編注：《李大釗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05頁。

⑥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五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73～174頁。

（作者係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